

# 中华

# 统

# 一



# 大略

历代著名统一方略透析



- ◆ 黄朴民
- ◆ 孙建民

解放军出版社

华

中

◆ 黄朴民  
◆ 孙建民

一

统

大

略

历代著名统一方略透析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统一大略/黄朴民、孙建民著.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2

ISBN 7-5065-4179-3

I. 中… II. ①黄…②孙… III. 战略思想—研究—中国—古代 IV. E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9663 号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北京国防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75

字数: 270 千字 印数: 5000 册

定价: 21.80 元

# 序

姚有志

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域内诸民族和政权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迁徙与融合，却从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文明认同始终如一。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统一的理念不断渗透于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人们一致的价值取向与理想追求。在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和广大民众看来，唯有实现“大一统”，国家才能获得最大的安全，民族才有应有的尊严，天下乃可长治久安。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就是统一观念深入人心的历史，是实现和维护中华民族大融合、大一统的历史。统一作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浩浩荡荡，气象万千，汹涌澎湃，一往无前。

考察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军事斗争和经济文化的融合，是历代实现国家统一的两条基本途径，这一共性现象也即基本规律决定了统一战略的实施者在做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全方位准备的基础上，普遍致力于积极制定正确的统一战争方略，使之作为自己从事统一大业的基本纲领，从而确保战争的顺利进行，圆满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这就是所谓“凡攻伐之道也，计必先定于内，然后兵出乎境。”（《管子·七法》）在这样的背景下，曾产生过许多脍炙人口、名垂千古的统一战略谋划，它们在特定的条件下发挥了“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巨大作用，成为中华军事文明史上的辉煌篇章。

纵观历史上卓越的统一战争战略谋划，有几个显著的特点不容忽视。

首先，它们均无例外地体现出中国古典军事传统尚智贵谋的本质属性。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滋育了独具特色的东方兵学，刀光剑影的血腥战争，掩盖不住中华战略文化尚智贵谋的主旋律。这一文化价值取向，使得统一战争的谋划者，在构筑其战略方针之时，都把“经武之略，在于贵谋”的原则奉为圭臬，践行不悖。众所周知，战争是力量的竞争与对抗，也是智慧的角逐与较量。而谋略则是智慧的储集，灵感的展示。古代军事家对此早有深刻的认识，强调“经武之略，在于贵谋”；“攻人以谋不以力，用兵斗智不斗多”；“以计代战一当万”。中国传统战略文化向来崇尚羽扇纶巾的运筹帷幄，而贬斥鲁莽灭裂的血气之勇。中国兵学的源头商周之际，姜太公首倡“本谋”，强调以谋为本。春秋是中国兵学的奠基期，兵圣孙武标举“庙算”，倡导“胜兵先胜而后求战”。秦汉以降，这一文化传统绵延不绝，而且被不断发扬光大，如汉代赵充国就主张：“帝王之兵，贵谋而贱战”，晋代军事家杜预亦自信“以计代战一当万”。他们既高度重视实力的建设，以此作为实现国家统一的前提和基础，更十分推崇战略的筹划，着力为实现国家统一制定高明的指导方针和具体的策略措施，做到以谋制敌，以智取胜。于是全面分析战略形势，认真构筑战略方针，恰当地确定战略目标，正确选择战略方向，具体规划战略步骤，妥善运用战略手段等等，便成为任何一个成功的统一方略中必备的内容。而它们正是战略家战争智慧的最集中体现。

第二，高明的统一战争战略谋划都十分注重从宏观上把握战略形势，呈现出高屋建瓴、统筹全局、超前预测的显著特征。

高境界的战略谋划和全局筹算，来自于深刻的洞察力，来自于对天下大势和敌我关系现状及其变化趋势的科学分析和把握。古人认为，“不足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因为“一域”不能代替全局，“一域”之得更不能弥补全局之失。换言之，全局决定着—域的存亡，

所以统一战略谋划成功的关键正在于能否认识全局、驾驭全局。而谋全局需要的是高屋建瓴、宏观控制的大见识、大魄力，处处高人一筹，时时占得先机。历史上，那些成功的战略家总是善于从错综复杂的局面中，清醒地分析敌我双方的优劣态势，充分考虑当时的战略地缘关系、综合实力以及战略布局与互动，在此基础上确定自己的战略目标，站在最高层次上寻求全盘皆活战略转机，尤其是夺取和掌握战略主动，营造有利于未来发展的良好战略环境。像《汉中对》以“还定三秦”为关键，从而为局促汉中偏狭之地的刘邦指出了“东向以争天下”的东山再起的契机；《隆中对》以“跨有荆益”为要着，为刘备指明了天下三分的前景；《雪夜对》则以先平南方为起点，为赵匡胤回答了战略方向选择这一关乎统一中原全局的关键问题。这些都是统一战略谋划者善于从大局着眼，积极把握战略目标这一关键的成功典范。其所反映的正是韩信、诸葛亮、赵普等人纲举目张、举重若轻的大局意识和见微知著、占隐察机的预见能力。

第三，历史上卓越的统一战略谋划，都普遍谋求用整体联系的观点和方法，将决策纳入有机综合的大系统中，文武兼备，刚柔相济。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之一，是其注重辩证思维，强调整体系统的动态平衡，这一点在统一战略谋划上也有突出表现。所以，他们能够在制定和实施统一战略过程中，超越单纯就战争而论战争的局限，而自觉地将其与政治、外交、经济、文化诸要素联系在一起，加以通盘考虑。所谓“凡战法必本于政胜”（《商君书·战法》），“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管子·侈靡》），反映的就是人们这方面的理性认识。因此《隆中对》在政治上主张“内修政理”，又在外交和民族事务上提倡“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为战争行动创造必要的条件。高颖在《取陈策》中主张通过破坏陈国的经济活动等方法，来配合和策应军事打击。这充分说明，谋划统一战争的方略是个整体的系统工程，只有多管齐下，才能事半功倍，最终实现统一全国的目标。

此外，战略谋划的成功也与战略家的个人素质有着紧密联系。历史上成功的战略家，无一不是胸怀天下、关注时事、博通百家、识运

独断的文武兼备之士。韩信生活在秦末大动乱时代，太史公言其“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他早年在项羽麾下，“数以策干项羽，羽不用。”其时已对天下大势了然于胸。所以投奔刘邦后，“数与萧何语，何奇之。”能打动汉王的相国，可证其才之奇，说明他对时事自有一番高见，而《汉中对》正是其才华与见识之自然表露。诸葛亮虽隐居隆中，躬耕垄亩，但自比管仲、乐毅，关注着时局的风云变幻，并透过层层迷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一旦风云际会，刘皇叔“三顾茅庐”，向其诚心诚意“谘以当世之事”时，便能献上隆中对策，为刘备势力摆脱被动，迅速崛起和壮大指明正确的方向。赵普追随赵匡胤在乱世中长期挣扎，并襄助其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对五代以来天下纷争、旋兴旋灭的现实及其消极后果的深刻体察，使得他把结束分裂，保证赵宋不再成为短命王朝作为自己的职责和追求，所以能在《雪夜对》中区分主次缓急，筹划统一与安邦之长策。

总之，欲成就统一大业者，无不重视战略谋划，而历史上每一次统一大业的成功，也无不赖于成功的运筹帷幄。所谓“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万年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成功的战略谋划正是历代统一大业的“灯”和“智”。当然，应该指出的是，古代统一战争的战略谋划也并非白璧无瑕、出神入化；在完成统一的进程中也有挫折、失败，甚至半途而废；在统一的地域范围上也有或大或小的悬殊差异。与之相应，本书中所选的统一战争方略，有的是服务于整个中华民族统一的方略，比如施琅《决计进剿疏》；有的则是统一中原的方略，比如赵普的《雪夜对》；有的则属局部统一的方略，如刘基的《平江南策》，这种情况的存在，恰恰反映了中华民族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过程的阶段特征和实现大一统的复杂性、曲折性，但它们都是统一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再高明的战略谋划，也要在实施过程中不断修补完善，因为细节不可一一如料，古今皆然，这或许是古代这些战略名对虽大体成功而又有失误的原因所在。尽管如此，这些历代统一战争中高明的战略谋划，仍是一笔弥足珍贵的军事文化遗产。换言之，中国历史奔腾向前、势不可挡的统一主流，对统一战争

战略谋划的形成和运用提出了亟切的需求，因此历史上层出不穷，蔚为大观的成功的战略谋划，为统一大业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源。

对于这笔丰厚的战略文化资源，自然有必要认真地加以研究和总结。其实，古人在这方面早已有了清醒的意识。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就曾向学生表示过，他自己“尝欲写出萧何、韩信初见高祖时一段，邓禹初见光武时一段，武侯初见先主时一段，将这数段语及王朴《平边策》编为一卷。”（《朱子语类》卷135）今天我们自然应该比朱熹有更高的境界，以更强烈的责任心与自觉性来从事这项有意义的工作，积极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军事文化，从中汲取有益智慧和启示，为完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提供历史的借鉴。

值得高兴的是，黄朴民、孙建民两位同志怀着强烈的军人责任感，主动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之中，凭藉他们自身的学术专长，利用业余时间，兀自经年，从浩如烟海的历史材料中搜讨考辨，遴选出《汉中对》、《隆中对》、《平吴疏》等近三十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统一战略谋划篇章，疏通文字，阐释旨要，并站在时代的高度予以研究点评，照远灼微，胜义迭出，使历代统一对策的基本状况、主要特色、精蕴要义及价值理念得到相对集中和准确的反映，同时也有助于读者从一个侧面领略博大精深的东方兵学的绚丽风采，这无疑是极有意义的。

是为序。

2001年10月于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  
(序作者为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部长)



## 中华传统军事系列

中国历代战争年表（上、下）

中国历代军事战略（上、下）

中国兵书通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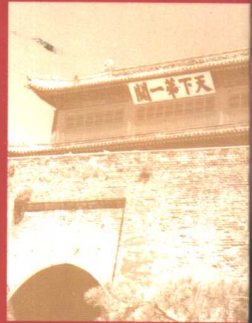
中国战书

中国战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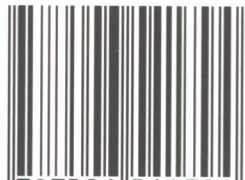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禁卫军

中华军事职官大典

中华统一大略



ISBN 7-5065-4179-3



9 787506 541794 >

ISBN7-5065-4179-3/E • 1903

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

# 目 录

序	姚有志
绪论：历代实现统一的基本经验 .....	1
阴修文德 翦商一统	
——《渭水对》（姜太公） .....	19
据山河之固 东向以成帝业	
——《商君策》（商鞅） .....	30
远交近攻 一扫六合	
——《客卿对》（范雎） .....	40
还定三秦 东向争雄	
——《汉中对》（韩信） .....	59
妙策平叛 再造一统	
——《平叛策》（周亚夫等） .....	71
略定河北 问鼎中原	
——《图天下策》（邓禹） .....	82
联陇制蜀 各个击破	
——《平陇蜀策》（来歙） .....	89
跨有荆益 鼎足三分	
——《隆中对》（诸葛亮） .....	96

<b>水陆俱下</b>	<b>以一四海</b>	
——《平吴疏》(羊祜)	.....	107
附录: 1. 《平吴表》(杜预)	.....	118
2. 《平吴疏》(王濬)	.....	122
<b>审时度势</b>	<b>杂于利害</b>	
——《王猛临终遗言》(王猛)	.....	127
<b>制敌命脉</b>	<b>混成一统</b>	
——《取陈策》(高颀)	.....	135
<b>多方误敌</b>	<b>一战而克</b>	
——《御授平陈七策》(贺若弼)	.....	141
<b>入居关中</b>	<b>号令天下</b>	
——《取关中策》(李世民)	.....	151
<b>以迂为直</b>	<b>稳操胜券</b>	
——《平叛策》(李泌)	.....	162
<b>攻取之道</b>	<b>先易后难</b>	
——《平边策》(王朴)	.....	176
<b>先南后北</b>	<b>安取天下</b>	
——《雪夜对》(赵普)	.....	189
<b>假道于宋</b>	<b>直捣大梁</b>	
——《临终灭金遗言》(成吉思汗)	.....	198
<b>中路突破</b>	<b>席卷江南</b>	
——《平宋策》(刘整)	.....	205
附录:《东师议》(郝经)	.....	213

<b>韬光养晦 固本待机</b>	
——《时务对》(朱升) .....	234
<b>先陈后张 逐一扫荡</b>	
——《平江南策》(刘基) .....	242
<b>先翦羽翼 后捣腹心</b>	
——《平元策》(朱元璋) .....	250
<b>决策入关 以图大业</b>	
——《入定中原状》(范文程) .....	259
<b>兵收晋豫 混一区宇</b>	
——《取中原启》(洪承畴) .....	269
<b>审机乘便 底定海疆</b>	
——《报明郑经病故克勤克墨被杀等事本》(姚启圣) .....	277
<b>因剿寓抚 统一台湾</b>	
——《决计进剿疏》(施琅) .....	288
附录:《边患宜靖乘便征取台湾事本》(施琅) .....	309
<b>跋:多元思维</b>	
——历代统一战略的思想方法特征 .....	318
<b>后记</b> .....	333

## 绪论：历代实现统一的基本经验

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中华民族至高无上的道德情感和理想追求。回顾和总结我国历史上实现国家统一的基本经验，揭示中华民族战胜分裂、完成统一的途径及其规律，乃是军事历史研究工作者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基于这一宗旨，我们致力于探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统一方略的成败得失，以期从中汲取有益的历史启示。

### 一、历代实现国家统一的基本模式

大致而言，在中华民族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史上，曾发生过五次最重要的统一事件：第一次是由战国七雄逐鹿走向秦统一；第二次是由三国对峙鼎立到西晋短暂统一；第三次是由两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走向隋统一；第四次是由唐末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大分裂走向宋统一；第五次是由宋、金对峙到元朝的大一统。除了上述最为著名的统一事件外，其他王朝在建立与巩固政权的过程中，大多也经历了曲折与艰巨的从事统一的斗争，如西汉刘邦战胜项羽完成国家统一，东汉刘秀控制河北、占据关东关中、平定陇蜀完成国家统一，唐代李渊、李世民父子击破群雄定鼎天下，明代朱元璋削平各割据力量、驱逐元朝势力开创一统局面，清代统治者镇压农民起义军、消灭南明政权、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实现大一统，等等。这些统一斗争的进程、规模、范围、形态以及影响和作用虽各有差异，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即它们呈现出一个带共性的实现统一的基本模式：政治相对占有优势、军事力量相对强大、战略决策比较高明、作战指挥比较正确的一方，凭借或运用必要的武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摧毁对手的抵抗意志，乃是历代实现国家统一的根本（也可以说是唯一）的途径。

换言之，希望践履孙子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原则，以和平

的方式来完成国家统一，在双方具备军事对峙能力的条件下，往往只是理想的追求而很难成为现实的选择。历史上除了极其个别的例子（像北宋初年割据浙江一隅的吴越慑于北宋的强大兵威而被迫献地归附）外，任何一次统一的完成都离不开武力的运用，这是基本的历史事实。

必须借助武力手段实现国家统一是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的。道理很浅显，被统一的一方往往过分强调自己集团的局部利益，而漠视整个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他们绝不可能以和平的方式交出土地、民众、财富，而接受敌对一方的统治。尤其是对于其统治者来说，社稷倾覆、国祚中绝意味着自己统治权益的彻底丧失，转眼间从富贵的云端跌入阶下囚的深渊，使自己的财富到个人的生命完全为他人所主宰。历史表明，亡国之君的命运总是极其悲惨的，很少能逃脱受辱横死的下场。即便是以宽仁著名的宋代开国君主，在对待南唐后主李煜时，也竭尽凌辱、折磨之能事，最终以毒酒鸩杀了结。所谓“宋受晋终，马氏遂为废姓；齐受宋禅，刘宗尽见诛夷”（《南史》卷43，《齐高帝诸子传论》），正反映了失败一方普遍的惨淡前途。在斧钺阴影底下，能够像梁武帝那样强装豁达，自我解嘲，“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夫复何恨”的，毕竟是极个别的现象，他们一旦预感到亡国后的悲惨命运，就自然而然要作出鱼死网破的决定，负隅顽抗，苦苦挣扎。于是运用武力最终解决统一问题遂成为不可避免的选择了。

当然，面临被统一的一方仅仅有抵抗的意志与决心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因素在于其统治者自认为尚具备进行抵抗的一定资本。这首先是他们还掌握着一支可用于沙场决一雌雄的军队，能够背城借一，与敌周旋；其次是他们尽管深知自己总体实力处于劣势，但是却认为在某些方面具有相对的长处，如可以利用江河大湖的险阻，抵挡住敌方的进军；再如某些兵种（舟师）在本土作战，易发挥特殊的优势，等等。这方面的史实是不胜枚举的，像东吴之所以顽固抵抗西晋的统一压力，就是仗恃着自己拥有长江天险，且舟师实力较为强大：“孙氏负江山之阻隔，恃斗牛之妖氛，奄有水乡，抗衡上国。”（《晋书》



卷42,《王浑王濬唐彬列传》)南朝陈国的情况亦相仿,其抗拒王师、维系分裂的主要资本,同样是“恃九江五湖之险”(《隋书》卷60,《崔仲方传》)。认为倚仗此条件可以防守自固,免于灭亡之厄。至于蜀汉、南唐等割据势力,在面临覆灭的形势时,也无不企图凭借地理环境、水师实力等等以作困兽之斗,因此,历代统一战略的实施者只能运用武力制服对手的顽抗,在此基础上完成国家的统一。

由此可见,在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事业上,“不战而屈人之兵”,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只能算是一种理论上的选择和追求的目标,并非带有普遍意义。因为它只有在一方处于绝对优势,另一方处于绝对劣势,而劣势一方又因各种各样的原因丧失了抵抗意志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遗憾的是这样的现象极其罕见,几近绝迹。相反的是通过武力方式实现统一成为最普遍的模式。对此,历代从事统一大业的决策者都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们虽然常常声称“传檄而定”、“不战而下”等等,但这仅仅是作为口号用以鼓舞士气、瓦解敌方而已,其真正的注意力始终置放在如何周密进行军事斗争准备,运用武力粉碎敌方抵抗,达到统一目标这一点上,即所谓“出师授律,应机诛殄”(《隋书》卷2,《高祖纪下》)。应该说,这样做也是合乎中国的文化特色与思维逻辑的。从历史考察,中国人在处理任何问题时,都习惯于区别理想追求与实际操作的辩证关系,既确定最高标准,用以弘扬己之理想,这是所谓“取法其上”,又立足具体目标,用以履践实行,这是所谓“得乎其中”。前者是说的,后者才是做的。如孔子虽主张“祖述尧舜”,但真正用力处却在于“宪章文武”;康有为追求“大同”,但实际致力做的是“变法维新”;孙子倡导“全胜”,但最重视的却是“战胜”,均是证明。这在历代统一问题上,也不例外,和平统一是旗帜是目标,武力统一才是现实。

在依凭武力完成国家统一的根本前提下,实施统一的一方还往往根据不同的形势和需要,选择两种武力运用程度有所差异的基本手段,具体指导和推动国家统一的进程。一是所谓的“无限战争”(绝对战争),即以纯粹的战争方式,毫不妥协地发起最坚决的攻击,将